

空间重构与全球正义的可能性路径

——论大卫·哈维空间正义的全球视域*

任 政

提 要 | 全球正义问题不仅是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題,而且也是全球空间结构与区域重组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塑造的空间框架与区域结构本质上是资本通过区域关系的空间建构和再生产,塑造被剥削区域,推进全球“剥夺性积累”的过程。从深层次来讲,空间框架与区域结构重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重塑全球政治格局,实现阶级权力的重建过程。因此,伴随着全球化过程,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与非正义问题也随着全球化不断扩张,走向全球与区域之间的不平等。

关键词 | 全球化 不平衡地理发展 全球正义 空间批判 大卫·哈维

中图分类号 | B089

作者信息 | 任政,1982年生,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235。

当今世界并不和谐,全球正义问题更是突出。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理发展中的主导趋势是走向集中化和不平等,是不公平的”^①。因此,全球正义问题不仅是一个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題,而且也是一个全球空间结构与重组的问题。空间批判是全球正义应有视域。为此,我们亟须从空间批判切入全球正义问题,反思与批判全球空间结构与重组问题,激活全球正义研究新视域,开拓全球正义的空间研究范式。

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与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学

当今是一个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从地方走向全球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扩张与积累的内在要求。一般而言,资本积累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最早的

“圈地运动”、殖民地的建立,走向今天“世界工厂”的开拓。但是,在哈维看来,“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② 资本只有通过不平衡发展及其“空间修复”才能化解危机,实现可持续积累。全球空间扩张与重组与资本积累是内在统一的,体现着资产阶级的意图与策略,始终服务于全球资本主义重组的利益与战略。随着资本的积累不断地由地方性积累走向全球性积累,形成了

* 本文系2016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价值规范视角下的空间正义范式研究”和上海社会科学院课题“当代都市社会正义规范转型及其重构研究”的阶段成果。

① [英]多琳·马西:《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4页。

②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全球范围内的“掠夺性积累”，开创了“资本积累的全球历史地理学”。哈维认为“掠夺性积累”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实现形式与特征。

1. 全球资源商品化与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与商品化、私有化内在联系在一起。“公有资产进行企业化、商品化、私有化，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计划的一项标志性特征”。^① 新自由主义致力于将商品化和私有化扩展到全球。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推动的资本跨国流动，取消了商品化的地方限制，开放了全球商品和资本交易市场，全球范围内的一切资源都在商品化。

商品化又不断推进与带动了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财产、银行、企业、土地的私有化进程加快，不断将“公有、集体、国家的财产权转化为排他性的私人产权”^②，而且“将私有权和利率置于平等与社会正义的权利之上”^③。伴随着私有化进程的推进，“资产从公有和大众领域转移到特权阶级领域”^④。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私有化过程在全球范围内掠夺与聚集了大量的财富。

2. 全球金融自由化

“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⑤ 金融自由化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和渗透能力，为资本的输出与扩张提供了理想的载体与渗透渠道。随着金融自由化，全球导向的金融资本的力量日益强大，获得了更大的扩张能力。而且，全球金融自由化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发生了重大转换，“重心从生产转向作为资产阶级力量中心的金融领域”^⑥。当代资本主义扩张已经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赤裸裸的殖民掠夺与工厂剥削，重心已全面转入金融领域。金融自由化使得“投机、掠夺、欺骗、盗窃成为再分配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⑦。通过金融自由化，使得“全体人民变成债务奴隶”，造就了资本积累与剥削的形式更加复杂化、隐蔽化，而且呈现生活化与弥漫化的态势。

3. 全球危机的管理和操控

全球危机的管理和操控也是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与实现形式。在哈维看来，“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制造、危机管理、危机操控，已经发展成为一场精心的再分配表演”。^⑧ 因此，世界范围内的危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与自发的结果，而是政治现象与人为制造的结果。“‘债务陷阱’一跃成为掠夺性积累的首要方式”。^⑨ 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控制危机、“强制性通货紧缩”、货币贬值实现掠夺性积累的。全球危机的管理和操控不仅弥补了资本主义国家传统的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等手段的不足，而且与其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剥削之网。

4. 全球资源与财富的再分配

在哈维看来，西方国家推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重要目的与主要实质就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⑩。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不可能也不会是利益的全球化、更不会让其他国家实现同样发展，分享世界发展成果。相反，他们是在不断地制造贫穷与落后。“颠倒资金从上层阶级流向下层阶级的过程”。^⑪ 因此，他认为这种分配的实质是“倒退式的再分配”，即所有的资源与财富都流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却为之付出代价。结果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财富在急剧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穷人越来越穷。所以，他明确指出，“再分配和不断增长的社会

①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

② 同上，第183页。

③ 同上，第204页。

④ 同上，第185页。

⑤ 同上，第38页。

⑥ 同上，第62页。

⑦ 同上，第185页。

⑧ 同上，第186页。

⑨ 同上。

⑩ 同上，第183页。

⑪ 同上，第188页。

不平等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的必然特征”。^① 资本全球化的过程必然造就“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结果”。

长期以来,西方研究者主要从“中心—边缘”的理论来解释与把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积累模式。哈维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一模式“从好的方面来讲是过分简单,而从坏的方面来讲则是误导”^②。在他看来,资本积累的历史地理学并不是一个简单中心—外围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重地点不断叠加,交互作用的产物。“资本积累的全球性提出了分散的资产阶级权力这个问题,恰恰由于它的多重地点性。”^③ 从根本上来讲,“资本具有粉碎、分割及区分的能力。”^④ 因此,资本全球化对全球空间的重构必然是一种差异性结构的塑造。所以,全球与区域之间的划分都是“通过资本积累和市场结构的分化力量而主动制造出来的”^⑤。资本全球性造就了全球空间的不平衡格局。而且,资本主义发展内在需要这种不平衡发展的地理空间。一方面,不平衡发展的地理空间成为资本积累的源泉,也是推进资本全球扩张的动力;另一方面,资本全球扩张又不断影响与塑造不平衡发展的地理空间,一定意义上生产与再生产了这种不平衡的空间关系与格局。全球的非正义性也是资本主义空间等级关系与格局的固有产物。

二、空间结构与全球阶级力量的分化、重组

空间结构也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表现。“资产阶级的地理使命就是在逐步扩大的地理规模上再生产阶级和生产关系。”^⑥ 从深层次来讲,空间重组与扩张不仅是资本积累的过程,也是资产阶级政治力量重建的过程。随着“资本转变其与国家和全球市场的关系,国内阶级结构也发生变迁”,国家与地区之间政治格局与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转换,主要体现在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一方

面是上层资产阶级力量的集中与聚集,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分化与瓦解。

1. 上层资产阶级力量的集中与聚集

从战略角度来看,西方国家上层资产阶级力量的集中与聚集是一种政治策略,更是一个全球性的综合战略选择。其一,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化是“一项旨在重新恢复阶级权力的计划”^⑦。从政治传统来看,自由主义的盛行的确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法治化、民主化进程。所以,新自由主义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与吸引力,从一定意义上主导着国际规范与秩序。西方国家极力主张与推广从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与规范出发来建构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但是,新自由主义化过程将自由经过了重新整合与重塑,赋予其特定的阶级力量重建的功能与意义。新自由主义掩饰的是“赤裸裸的阶级力量的重建或重构,这样的现实发生在地方和跨国的层面”^⑧。因此,新自由主义化过程既是一个制度输出的过程,也是一个西方国家势力不断扩张与介入的过程。具体而言,西方国家所强制推行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成为普遍制度构架,跨越了不同民族国家与地域群体身份差异,最大限度地容纳了一切国家与地区,以此建构新的制度认同、民主追求。事实上,以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作为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进步与落后的评判标准,主导国际社会,重塑国家与地区之间政治格局与阶级力量。

①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2010年,第18页。

②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2006年,第32页。

③ 同上,第33页。

④ 同上,第39页。

⑤ 同上。

⑥ 同上,第26页。

⑦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2010年,第20页。

⑧ 同上,第136页。

2. 权力聚集与集中于“世界金融中心”与“精英阶级”

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推动阶级力量重构的核心步骤主要是在双重维度上展开。从重建的主体来说,“政治经济精英阶级”是权力重建的组织者与推动者。所以,权力重建的主体就是资产阶级中的“政治经济精英阶级”,其主要目的是上层阶级不断集中与聚集权力。为此,工商业巨头、金融业投机家、跨国企业的总裁等“政治与经济精英”不仅囤积巨额财富,而且获得了主导性与支配性的力量。从地区来说,随着资本主义重心从生产领域到金融领域的转换,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主要集中在“世界金融中心”。“阶级力量并没有恢复到任何传统部门那里,相反广泛集中到了全球金融业务中心之中”^①。当然,这种权力集中既体现为直接的金融政策与规则的设置,也包括间接的控制与引导整个财富与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以此达到与实现他们进一步聚集与集中权力的目的。

3. 世界金融市场是阶级力量重建的首要手段与推动力

无论是从主体还是从地区来看,阶级力量的重建奠基在金融市场根基之上,依赖于金融市场的支撑与配合。哈维认为,金融市场“提供了获取并聚集财富的方式;它们成了重建阶级力量的首要手段”^②。从深层来看,资本支配下的全球金融市场体系与分工格局具体形成与确立了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同地位与关系。上层资产阶级与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是通过有组织的控制与支配其他阶层与区域而获得的,以此达到“集中权力”,维护其核心利益的目的。事实上,世界金融市场的运作服务于世界领导角色与地位的再生产。纽约、伦敦、东京等世界金融中心主要通过自身的优势,整合与引领世界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并且垄断与支配世界金融市场的运作,以此将自身塑造成为世界的中心,聚集世界财富与权力,巩固与维

护其霸权地位。正因为如此,哈维将全球金融城市称之为“财富和特权的孤岛”。

4. 全球性的经济性组织是阶级力量重建的重要载体与实现渠道

首先,西方国家通过构筑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建立全球性治理体系,实现了控制形式由地方走向全球,形成了全球秩序,并通过这样的秩序与治理体系的优势加强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支配与控制,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塑造与提升其在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和权力。在哈维看来,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贸易组织设置了新自由主义标准和全球经济互动的规则。但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首要目标是打开尽可能多的世界地区,让资本自由流动,因为这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金融力量从世界其他地区榨取贡金的根基”。^③因此,全球性的组织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特定阶级集团的利益。同样,跨国企业组织也借助其缔造和控制下的企业组织和产品谋求推进自身的实力的建构与权益的增加。当前,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目的是维护自身规则的制定者与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与身份。因此,全球性的经济性组织在维护与塑造新自由主义国家霸权地位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次,工人阶级力量削弱与分化。伴随着上层资产阶级权力的聚集与集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受到有组织的打击,传统以团结与聚集为特征的工人力量不断衰落,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逐渐被削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其一,资本主义生产的转换与去工业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生产领域向金融领域、服务领域的不断转换,生产的知识化、技术化加快了去工业化进程。哈维提出,“去工业化带来的工

①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2010年,第72页。

② 同上,第103页。

③ 同上,第106页。

作结构急剧转型使得工人阶级凝聚力涣散”。^① 因此,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转换与去工业化,传统工人阶级不断分化,工业无产阶级地位整体陨落。

其二,劳动力市场的转换与临时雇工制。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通过整合资源、灵活调整等方式,采取了丰富多样的雇工制与策略。在信息时代,伴随着生产的信息化、自动化,劳动力雇佣的灵活性更是得到集中体现,资产阶级“采取了临时雇工制”。^② 临时雇工制的采取与实施,不仅使得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而且严重破坏了工人阶级的集体力量。

其三,全球的生产与劳动分工的巨大变化。在资本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跨越了具体的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雇佣劳动、组织生产,形成了全球性的劳动分工。由此,资本主义生产不仅可以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最廉价和最顺从的劳动力,而且也可以分化全球的工人阶级。工人自身的地理流动性有限,“地理上的资本流动却使之能够统治全球劳动力”^③。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区域、城市的工人之间相互竞争,反而“增强了资本主义优势”。所以,西方国家凭借其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不对等的生产与分工关系,以此压榨与剥削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劳动成果,推行“新殖民主义”。因而,“在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全球范围内‘任由摆布的工人’非常典型”,^④出现了“全世界血汗工厂”。

总之,地理重组所导致的阶级力量的分化、重组,一方面造就了世界范围内少数富人与社会精英阶层的聚集;另一方面造就了贫民阶层的出现与不断扩大,全球不断走向两极分化,对抗频繁,成为对抗性世界。

三、地理政治学与全球正义的可能性路径

不平衡地理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大重要问题,也是造成全球非正义的重要根源。日益加剧的全球不平等不仅是不平衡地理发展

的结果,而且进一步推进了不平衡地理发展。所以,解决全球正义问题不能限于政治经济的变革,也需要调整与改变空间框架与地区结构。由此,哈维的地理政治学不仅是剖析全球正义问题的一种批判话语,而且也是推进全球正义实现的行动纲领。所以,我们必须把全球正义问题放置在不平衡地发展格局背景之下,从空间框架与地区结构的重构中探讨推进全球正义的可能性路径。

第一,地理扩张的界限与资本的界限。“地理扩张的力量存在着某种界限,它不能无限制永久性地发挥作用”。^⑤ 因此,哈维认为,虽然地理扩张在一定空间、时间范围内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地理扩张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一方面,随着资本的地理扩张不断由地方走向全球,地理扩张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界限,不可能无限制扩张。特别是,“大量固定在空间中的资本成为别处实现空间修复的障碍”。^⑥ 因此,地理扩张的界限也是资本的界限。资本积累不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另一方面,地理扩张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危机。相反,地理扩张折射与反映了西方文明与发展模式深层次的矛盾与危机问题。首先,西方发展模式缺乏足够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没有也不愿包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与实践。随着西方社会发展的不断深入,西方发展模式本身不断凸显出排他性与封闭性。西方社会也逐渐走向了功利化、狭隘化,最终只能导致西方不断衰落,走向灭亡。其次,地理扩张激发了资本家的贪婪与欲望。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无限索

① [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2010年,第71页。

② 同上,第129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2006年,第26页。

⑥ [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95页。

取,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对抗的加剧,必然遭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联合反抗,西方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不断凸显。最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分裂以及社会内部的矛盾也在加剧。西方国家的自我独大、自我封闭以及相互争夺也导致了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与冲突。同时,西方社会内部的矛盾不断激化,阶级斗争、女权主义斗争、后殖民主义斗争、种族斗争等不断挑战西方国家的权力。西方国家的发展将难以持续。

第二,工人阶级的斗争从工厂转向城市。传统的阶级斗争主要以工厂为组织与活动空间,并且“通过联合运动、政治政党等类似形式而得以扩大”^①。这种斗争形式集中表现为工人的罢工斗争与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但是,在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已经由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到了后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重心不断转向金融领域、服务领域,生产不断去工业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地点不再集中于工厂,其组织形式更加灵活多样,范围包括整个地区甚至世界,生产更加富有弹性。工人阶级不再聚集于工厂之中,其力量也变得更加分散。随着“工厂的消失或变得如此不稳定从而使永久性组织变得非常困难”。为此,以工厂形式为组织与活动空间的运动形式必须相应地发生转换。哈维提出,工人运动要以整个城市范围来组织与活动。所以,工人阶级运动必须创新阶级斗争的形式与内容,开展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以适应不同空间形势下斗争的需要。因此,“争取最低生活工资的运动”、“争取城市权利的运动”,甚至包括“占领华尔街运动”都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可以说,无论是工人阶级斗争还是社会主义运动都需要特定的空间组织形式,也需要在特定的空间领域中开展斗争。哈维强调,无产阶级运动必须“学会如何对抗资产阶级支配和生产空间的权力,学会如何塑造新的生产地理学和社会关系”^②。因此,工人

阶级运动必须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与资产阶级争夺支配和生产空间的权力,其意义不仅在于对抗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空间生产一种新的空间框架与地区结构、一种正义的空间。

第三,开展微观空间与宏观空间两个空间规模上的斗争。资本积累是在多重空间规模下进行的,从宏观上来讲,资本积累具有跨国特性,不断由地方走向全球。从微观上来讲,资本积累具有普遍特性,无孔不入,将一切都资本化、商品化,包括人的身体。为此,哈维认为,“对抗资本积累的普遍和跨国特性”^③需要开展不同空间规模的斗争。他提出,要“把身体和个人的微观规模与全球和政治经济的宏观规模连接起来”,“同时在两个空间规模上与资本作斗争”。^④其一,开展身体的微观空间斗争。伴随着资本的普遍化扩张,从“生产的机器”“消费的机器”到“身体景观”,身体以不同的形式不断被整合进资本积累当中。所以,身体也是资本的“一个积累策略”。因此,身体在资本的创造与积累、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过程中都起着根本性作用。正因为如此,身体的反抗也成为反抗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与节点。哈维指出,“阶级政治学必须以富有意义的方式回到个人”。^⑤因此,我们必须从身体出发思考对抗资本积累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身体的反抗表现为“身体的不配合、不顺从、身体的叛逆,实质对抗权力与支配关系的再生产”。^⑥所以,必须提高身体的反抗意识与自觉,增强身体在对抗资本积累过程中的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其二,开展“全球化”的宏观空

① [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2006年,第48页。

② 同上,第46页。

③ 同上,第50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第48页。

⑥ 任政:《空间、身体与生存境遇》,《社会科学论坛》2016年第9期。

间的斗争。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创造与积累,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都不再局限于某一地方,都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组织与进行。资本的积累高度依赖于全球运作与实现形式。资本主义的全球生产与重组也导致全球财富分配与占有的两极分化,成为全球非正义的重要根源。所以,空间框架与地区结构的调整与重构需要在“全球化”空间规模上开展对抗资本积累的斗争。总之,对抗资本的积累需要实现微观空间与宏观空间斗争的相互协作、相互配合和相互促进,以此形成多种空间尺度的斗争。

第四,阶级对抗走向区域之间的联合反抗。随着资本的全球化与地理发展不平衡,世界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不断走向剥削与被剥削,分化不断加剧。所以,世界对抗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不断走向更大范围内的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对抗与斗争。由于全球斗争形式的转换,对抗资本主义的主体不断走向多元化,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工人阶

级主体,反抗的主体囊括了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主体。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消除对抗,反而激起了地方的联合反抗,为全球更大范围内的整合一切反抗力量的联合斗争提供了可能。哈维提出,“反资本主义斗争创造了多样性的地形,而那些斗争则需要以这样一种方式综合起来”。^①因此,反抗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最终取决于被剥削、被压迫、被支配的各个城市、区域之间的联合反抗。当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斗争都在不断地挑战与重塑阶级利益。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一体化组织也正在极力推动“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及其规则,逐渐挑战与瓦解“不平衡地理发展”,重塑全球空间结构与区域格局,推进区域民主与空间正义的实现。由此也必然推进全球正义的实现。

(责任编辑:张 莉)

※

※

※

^① [美]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00页。